

目 录

张凤鸣	王学文原稿 邵铁范补充整理	(1)
章剑英	陈振亚	(7)
王懋长	王理长	(13)
黄 旭	王学文	(14)
王伯勋	邵铁范整理	(16)
王宪章	陈翰辉	(28)
韦 杵	韦富荣 贺光澍整理	(35)
袁祖铭	陈振亚 整理	(52)
王仁孝	谭华贵	(66)
李其魁	王学文	(71)
贵州省保安十七团起义前后		
	袁 海 邵铁范整理	(75)
龙广暴动	袁 海 邵铁范整理	(82)
安龙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邵铁范	(94)
安龙县抗日阵亡将士名录	房 健	(113)
更 正	编 者	(121)

张 凤 鸣

王 学 文

张凤鸣，字于岗，在从事地下党活动中化名刘成斋，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生于贵州省安龙县西门坡一个较为优裕的家庭。其父张玉铨从事商业，守信用，为人正派，由于从事工商业活动多年，见多识广，对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政治混乱，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极为不满，常以正义教子，张凤鸣在其父朴实的性格，严谨的家风熏陶下，自幼养成了个性刚毅，品行端正，勤奋好学正直坚毅的性格，奠定了他以后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基础，幼时，就读于县城大田坝张泽民先生的私塾，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转入安龙县立两级小学高一级（当时小学为六年制，一至四年级为初级，五、六年级为高级），一九二六年冬季毕业，一九二七年春考入安龙县立初级中学，在学期间，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一九二九年冬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安龙初级中学第二期。其父鉴于其学习态度认真，成绩优良，认为有培养前途，便变卖了部份田产，送他到南京读书。

一九三〇年，张凤鸣到南京进入了安徽公学高中部。在此期间，他除研读学校所设课程外，还阅读了不少课外书籍。他读书兴趣广泛尤爱鲁迅先生作品，从中受到启发。他在读鲁迅先生《故乡》一文后，曾深有悟解地写下了“阶级的悬殊，使这两个青年的好朋友疏淡了”的眉批。从而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张凤鸣，已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他在南京就读期间，有机会拜识了教育家陶行知和民主爱

国人士沈钧儒等，沈老曾将自己写的《寥寥》集亲笔题名赠给他。在此期间，由于接触面扩大，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得以读到《列宁文选》、《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本藏原惟人的《唯物史观》以及《响导周刊》等进步书刊。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下，使之在思想认识上有了一定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当时正集中力量进行内战，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外妥协，对内则疯狂镇压，致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就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将东北三千万同胞置于日本铁蹄之下。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义愤，许多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组织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凤鸣在自己的社会岗位上以朴实的爱国热忱进行着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揭露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他的一些言行，虽然受到进步人士和社会下层的好评，但也触怒了权贵。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侵占了我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及沿海的大片国土，抗日救亡的重担，落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肩头。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张凤鸣在普安任教育科长期间，与当地一些进步人士一道组织民教馆出简报，办阅览室等，宣传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重要意义等。他的这些活动，受到了中共贵州临时工委黔西区的注意，通过地下党员高某与之接触，了解到张凤鸣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拥护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和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并将张的情况向黔西区的负责人之一的张立同志作了汇报，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地下党派员与之接触，对其进行有益于抗

日的工作给予引导和协助，因而张在思想认识上有很大提高，为地下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贵州地下党也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地下党奉南方局的指示，在疏散、隐蔽党员的过程中，张凤鸣同志曾掩护共产党员高德藩、肖维亮二同志脱险，安全离黔。之后，张凤鸣也离开普安转到贵阳。

一九四一年，张凤鸣到贵阳后，先在贵阳市政府民政科任科员，后任贵阳市第二区区长，在任区长期间，由于他办事认真，公平正直，受到群众的好评，二区民众曾送他“公平正直”玻框匾额一块。他对人热情，结识了不少青年朋友，大学生中也不乏其友。在此期间他仍和在重庆的高德藩同志保持着通讯来往，并经高德藩推荐与地下党的贵阳组织取得联系，并能根据党的要求为党做一些工作，同时他在思想认识上也进一步提高，逐步地按共产党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一九四四年“黔南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贵州，在贵阳的权贵纷纷准备逃亡。而张凤鸣则表示：无论日本人打到那里，我都不离开贵阳。并准备在贵州开展抗日游击战，疏散了眷属，只身住在贵阳，直到抗战胜利，这充分体现了张凤鸣的爱国热忱。

一九四五年十月，张凤鸣受高德藩的约会由贵阳到达重庆，张与高在重庆相聚数日，感情甚洽，畅谈了普安别后的相互情况。高德藩将张的情况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作了汇报，八路军办事处据张的表现和形势的需要，派《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约见了张凤鸣，鼓励他加强学习，利用其

合法身份，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宣传，有策略地为党做些工作，并指示高德藩继续与张保持联系。这次重庆之行，张深受教育和鼓舞，使之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提高，工作上有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即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进行了全面反击，开始了解放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后，长期在贵州隐蔽的共产党员，又相续组织起来，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张凤鸣积极投入这一运动，按照地下党的布置，他团结青年，散发传单，尤以一九四六年年底进入贵阳《中央日报》社任编辑后，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条件，组织文稿揭露黑暗，抨击当局，申张正义，表达了民众的心声。

一九四八年一月，原在贵州工作的张立同志，奉川东特委派遣回贵州工作后，通过党组织与张凤鸣取得了联系，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又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张凤鸣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尤其是一九四五年重庆之行后，更能自觉地积极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在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秘密，觉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经组织批准，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吸收张凤鸣入党。张凤鸣入党后，组织上交给他负责宣传、联络、情报等极其重要的工作。此后，由于他工作上方向明确，如虎添翼，兢兢业业，夜以继日，虽身患重病仍坚持不懈。在联络方面：他负责华南局，川东特委与贵州工委的信件转送和省内部份组织与党员和省工委的联系，他积极负责地往返于秘密联络点

和领导之间，及时的将上级的指示和下级的请示送到领导手中。在情报资料方面：一九四九年初，省工委建立不久，白色恐怖笼罩贵州，地下工作非常艰苦，不说其他，省工委连电台都没有，无法直接与上级联系，对时局、战况以及党的新政策、新法令等也只能从敌人的报纸“缝中”去寻找消息、获取资料。省工委为了加强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进攻的节节胜利，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给白色恐怖下的贵州人民以鼓舞，党组织指令打入敌人重要部门的张凤鸣等同志，搜集情报和资料，张凤鸣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经过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锐敏的分析，写出了《告贵州人民书》和《不要再糊涂了》两篇富战斗性的文告，通过各种渠道在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传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这两篇文告的写成，与张凤鸣同志积极认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宣传方面：他利用贵阳中央日报社编辑和贵州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师的合法身份，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进行革命宣传，并因之而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张凤鸣在上班的路上，被特务以嫌疑分子抓走，关在城东一个普通监狱内，被抓后，一方面由于敌人没有掌握确证，再是审讯中张凤鸣同志的机敏应答，敌人抓不住把柄，一个星期后，不得不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但从此敌特机关经常派特务对他进行盯梢、跟踪，时有重新被捕的危险，领导上为了张凤鸣同志的安全，曾劝他暂离贵阳转到安全的地区，但他考虑到自己所担负的工作极为重要，一时也找不出更合适的同志来接替，因而他坚持留在贵阳，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机

敏地躲过特务的盯梢，掩护同志，传递情报，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九年八月，地下党员岳某被捕，敌人在查找岳某的职业介绍关系时，发现与张凤鸣有关，因而敌特机关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再一次逮捕了张凤鸣。当时贵阳敌特机关，只知地下党的负责人叫张立，但不识其面貌和职业，张凤鸣被捕后，敌人怀疑他就是张立，对其百般刑讯，要他供出地下党贵阳的组织、人员等情况，当张凤鸣同志发现敌人这一误认后，在张立同志已经转移不在贵阳的情况下，他承认自己就是张立，敌特机关如获至宝，屡施酷刑，要他招供，而他则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痛斥敌人专制独裁、内战祸国的罪行，对党的机密，则始终严守，敌人没有从他的嘴里得到他们所需的话。后来，敌人发觉张立已经转移外地不在贵阳，认为自己受了愚弄，恼羞成怒，对张凤鸣酷刑倍加，但都未能使之屈服。

当敌人的末日来临，贵阳即将解放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敌人将张凤鸣同志枪杀于贵阳红边门外，时年三十九岁，张凤鸣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凤鸣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系据王学文原稿，邵铁范补充、整理

编者

章 剑 英

邵铁范整理
陈振亚

章剑英，又名恒芳，一九三五年在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医务处时又临时改名兆傑，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初十）生于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原属崇德县），生身父母为农民，为生活所迫，剑英出生三天襁褓中即被章姓收养，本姓佚传。养父名章纯甫（粹仁），原籍浙江省肖县长河镇人，青年时为米店学徒，由于为人作事精明强干，后被聘为石门镇《入益茂》酱园的经理，于一九二四年夏去世，养母韩福恩，出生农家，勤劳朴实，青壮年时除家务劳动外，还为别人缝制衣服等手工劳动辅助家计，后在杭州同济教会谋职，活到八十多岁，解放后才去世。

剑英幼时，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时当地可称为“小康”之家，养父去世后，尚可靠约贰千元的遗产，维持生计，加之养母手工劳动收入，生活尚不至冻馁。因系“独子”，家中除养母外，别无他人，经常独处，不与他人来往，久而久之，养成了较为孤僻的性格。养父去世时，剑英年方九岁，与养母相依为命，孤儿寡母之家，常遭变故，为人所欺，使之早熟感到世态炎凉。

剑英一九二一年（六岁）上学读书，一九二七年（十二岁）夏高小毕业，一九二九年春随养母从石门镇迁居杭州，在“基督教使徒信心会”办的培德中学念书，一九三〇年随校迁至肖山县西兴镇，一九三一年夏转入杭州惠兰中学念

书，无论在那里读书均能刻苦用功，加之天资聪慧，学业优秀。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仃学在家，在这段时间里读了一些古诗、词、小说、散文、杂文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书刊并练习写作，尤爱修辞、诗作，从此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三二年四月到杭州广济医院男护士部学习，一九三五年三月毕业。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这一段时间里先后在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医务科，陆军第十师医务处、南京军医署、上海同仁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宁波华医院等单位任护士、总护士长等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剑英由宁波到上海探望养母，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街头，日军坦克隆隆，南京路上遍布侵略军的行列，太阳旗代替了黄浦江上的米字旗、悬条旗，一时，战云密布，上海成了日本侵略者进攻东南亚诸国和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大本营。满腔热血的中国青年，纷纷离开故乡——敌占区，到前线、到大后方，直接、间接地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二十六岁的章剑英也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毅然离家，几经周折辗转数千里，于一九四二年春，到达云南下关。当时，中美军事人员正在集中力量修筑通向东南亚要道的滇缅公路，参加筑路的美方军事人员总医院设在下关，剑英由于英语基础较好，便在总医院找到了工作，任代理总护士长。时值日军在印缅战场进行全线攻击，筑路工地常遭日机袭击，加之烈日当空，施工人员在高温下工作，伤病员猛增，每天工作不分昼夜，异常艰苦。在日机轰炸保山时，亲眼看到了死难同胞横尸原野的惨景，使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两眼远望前方，怅然若有所失，便随口低吟了李白“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纓”的诗句，表达心底深处的愤

慨。一九四二年九月，剑英被调到昆明美军第九十五医院任住院部病房护士长。当时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在上海同济医院时的同学葛光信、张大柏等人，他们都是为了抗战从“下江”来到云贵高原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剑英离开第九十五医院，十月转到贵阳，从此生活无定所，为谋生辗转黔境，先后在贵阳市卫生局所属医疗单位工作，“黔南事变”后又到清镇，一九四八年因贵阳卫生局长系杭州广济医院同事，在他和沈守成的协助下，又在贵阳三桥开诊所。一九四九年初得知贵州省医院要在兴仁成立分院，卫生局征求剑英意见，是否愿到兴仁，他想省医院待遇优厚，工作安定，在一定时间后又可转到贵阳，因而就决定到兴仁，因三桥诊所一些手续要办，一时走不了，又怕失去机会，就叫其爱人李美云先到兴仁进行联系。李美云到兴仁后，才知成立分院告吹，因交通不便一时又回不到贵阳，滞留兴仁。剑英在贵阳处理诊所事务后，不见其爱人消息，就急急赶到兴仁，到兴仁后才知分院成立无望，此时，欲回贵阳，则三桥诊所已处理，欲留兴仁，兴仁是黔西南绥靖公署所在地，兵多乱多，非理想的久留之地。后听说安龙气候温和，又是古城，为长久谋生计，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携眷从兴仁到安龙，在北大街市巷口挂《恒芳诊所》牌子开诊。开诊后，由于其医术较高，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的医德，对病人认真负责、细心诊治，加之新药较多，疗效甚佳，又收费合理，因而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故不得不限额应诊，但对急、重病人则是随到随诊或出诊，再是信守“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不论那一阶层的病人，都一视同仁，对劳动群众有困难的患者，收费克己，受

到安龙各界各阶层人士的好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安龙和平解放。解放初期的安龙，一切均需从头做起。尤以医疗卫生设施，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留下什么，十几万人口的县，几千人口的县城，虽有一个卫生院也是徒有虚名，几个私人西医诊所和几间中药铺就是县医疗卫生的全部设施。解放后来安龙的工作人员有病，只得在私人诊所就医，〈恒芳诊所〉即是就诊点之一。当时缺医少药现象极为严重，广大农村的情况则更糟，人民政府为了使城乡医疗卫生条件迅速得到改变，采取了应急措施，举办卫生员学习班，组织有经验的医生讲课，由于教材缺乏，就请剑英为训练班编写教材，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编写了〈医疗卫生初级讲义〉，讲义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常见、常发病的病理和常用药的药理，《讲义》成了训练班的主要教材。在县人民政府着手组建安龙县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前身）时，根据工作需要，县党政领导多次邀请剑英参加医院工作，由于某种原因，剑英表示暂不参加，但县卫生院的手术、会诊等活动，他都积极义务参加，有请必到。

一九五六年八月，安龙划归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加快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州府希望有医疗技术的各界人士，参加医疗卫生工作。剑英通过解放后几年的观察，认识到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谋福利的党，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才能彻底获得解放，各项建设事业才有无限发展的前景。因而主动找到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陈照祥同志，要求到县医院工作。经县委研究后给了他满意的答复，从此剑英走上了自己要走的最有意义的道路。在工作中他每遇有疑难症，都结合病

例查阅资料，对症下药，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刻苦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县医院掀起了一股自我学习的风气。工作中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除继续发扬高尚的医德外，对病人则是病情、心理治疗同时并重，收到了良好的医疗效果。工作中他虚心好学善于吸取别人一技之长，对知识增长永不满足。在他对西医临床有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他又刻苦学习中医，他在新华书店购买和订购了《医宗全鉴》、《本草纲目》、《内经的哲学及中医学的方法》《衷中参西录》等书籍学习研究，还经常向有经验的中医求教，他学习认真，进步很快，并将所学中医知识用于临床，在安龙县医院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先例，博得了病人的好评。由于他工作积极，学习认真，成绩显著，一九六〇年二月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县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三月又出席安顺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者先进代表大会。回县后不久，被任命为安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剑英被任命为副院长后，工作更加积极，一九六三年二月又荣获安龙县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尤其是他的良好医德，在安龙城乡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他的历史经历，在十年动乱的逆流中，首当其冲，“造反派”强加给了什么牛鬼蛇神、反革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莫须有的罪名一大堆，但安龙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却不怕剑英这个“反革命”，每天都有不少干部、群众请章医师、章院长或章同志看病，他不避嫌疑，仍细心、耐心地为病人看病，就连那些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登门求医者，也不乏其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剑英的问题得到了落实，恢复了副院长职务，他又得到了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机

会。年过花甲的剑英，又焕发了青春，激情满怀地走上了岗位。一九八〇年三月，政协安龙县委员会机构恢复，在同年七月召开的政协安龙县第四届委员会上，被选为副主席（驻会）。他为了能继续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疾病，要求保持了县人民医院的处方权，因而在政协任职期间，他除搞好政协本职工作外，仍不断为求诊病人义务看病，在看病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为不少病人及时解除了痛苦，同时也减轻了医院门诊的压力。他以辛勤的劳动、诚恳的态度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任，先后多次当选为县、州人民代表、州政协委员，政协安龙县一、二届常委，三、四、五届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当选为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在实际工作中遵循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尽职尽责，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剑英同志在赴贵阳参加贵州省第六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途中，在断桥坡处遭车祸，不幸以身殉职，享年七十岁。殉职后，为表彰其身前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共安龙县委根据他生前的要求，报请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批准，追认章剑英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批复全文如下：

〔1985〕函字57号

中共安龙县委：

你县7月10日的报告悉，省委于10月8日批准追认章剑英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希望你们结合整党，组织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学习章剑英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

1985年11月2日

章剑英同志永垂不朽！

王懋长

王理长

王懋长，布依族，一九一〇年生于贵州省安龙县西乡纳兰寨——今龙广镇纳兰村，幼时在家务农。其父泽甫，母潘氏，兄弟五人，懋长居长。懋长性笃诚，善待弟妹，与村寨同年亦能和睦相处，寨中父老多称他是个好孩子。六岁启蒙入学，爱学习，肯用功，每年考试，成绩均列前茅。一九二五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盘江中学，一九二八年初中毕业，被龙广小学聘请任教，由于教书工作与自己兴趣不合，决心从戎报国，征得父母同意后辞去职务离家。

一九三〇年，懋长几经周折到达南京，适逢军校招生，即报考了军校，由于幼时患“天花”后面部留下的麻点，影响了他的考试，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从戎报国的决心，即以零工收入维持生计，以待时机。后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多方求情，才得以“家乡人”的情面，得到了他的支持，始得到黄埔军校报名应试并被录取，三年的军校生活，培养了意志，学得了军事知识。一九三四年元月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任见习排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同年八月又大举进攻上海，时懋长随部驻防苏北，奉调上海参加抗战，在一次战斗中因腹部受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懋长重返前线，任三十六师一〇八旅二一六团团副兼营长，驻守河南商城一带。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在对日的一次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黄旭

王学文

黄旭，名学文，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龙县城内府后街的一个贫家。其父黄聘三，母陈氏生有三男二女，他排行居二。三弟黄学礼早亡，么弟黄学义因黄旭关系送入了重庆遗族学校，毕业后在交警队工作，一九四七年任营长，驻防沈阳，因有反对内战言论，被关押受酷刑而死于狱中。父母早亡，现仅有大姐年约九十岁适安姓，二妹年约七十岁适刘姓，均健在。

黄旭幼时在安龙县立两级小校读书，他勤学好问，貌英爽，身材魁伟（一米八二）。老师常给他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故事，从小就受到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因之，对外国洋人无比的仇恨，立志要从戎卫国。如上学时路过天主堂门口，经常用石头击洋人的住房，还唱歌骂道：火烧天主堂，神甫坐牢房。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三月，安龙县城被桂匪劫城，家产被洗劫一空，学校也停办了，黄旭便离开家庭到贵阳考进陆军讲武学堂。后在黔军袁祖铭总司令部副官处任职兵弁，随袁入川转战有年，袁祖铭受委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军次湖南常德失败，黄旭只身到广州投入国民党中央陆军第一〇三师参加北伐。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黄旭毕业于黄埔军校军官研究班宪科，在中央陆军第八十三师二百九十七团一营三连任连长。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驻防南京（原三十四标营地）整训，接受德国式军事训练（教官德国人）。此时，他自己聘请教师辅导，刻苦攻读，诵古文，练书法，假不外出，不谈恋爱，一心钻研，并爱好京剧，尤善自拉自唱。

日寇进攻上海，“淞沪之役”黄旭率领陆军一连防守苏州河，以御侵略的鬼子兵，在敌人以十倍之兵力，并配合飞机轰炸，大炮猛攻之下，他率军英勇顽强进行抵抗，伤亡惨重，一连士兵所余为数不多，情况十分危急，虽一再请求增援，但一直没有援军前来，形成孤军（仅有十几人）困守阵地，最后以寡不敌众而撤出阵地。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黄旭奉令率部北上抗日，隶属关麟征师，开往长城。他对士兵讲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卫祖国，收复失地，是军人的天职，要抱定誓死抗敌的信念，誓与南天门共存亡的决心，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他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夙愿终于到来了，他参加了古北口战斗，在炮火猛烈，展开血战之际，他身先士卒，愤怒万分，奋勇杀敌，于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在古北口南天门阵地以身殉国，尸首乘寻获，时年仅二十五岁。安龙县地方政府曾对其家属给予抚恤。

地方人士为了悼念抗日将士黄旭为国捐躯，开了抗日阵亡将士黄旭追悼大会，并迎其抗日阵亡将士之牌位进入了忠烈祠，以慰忠魂！

资料来源：（1）安龙档案馆财政科卷宗
（2）刘正谊提供及笔者回忆

王伯勋

邵铁范 整理

公元一九〇〇年，王伯勋生于贵州省安龙县城广东街故宅，系书香之家。其祖王允嘉、父王金堤都是岁贡进士，伯父王金甲是殿试进士，故有“一门三进士”之称。其祖辈、父辈虽多系读书人，亦有金榜题名者，但无人进入官场，多以教书为业，知书识礼，颇受安龙多方人士的尊重。

四岁进入私塾，聪明好学，得到祖辈、父辈的喜爱。并能与伯父对答作句，有一次其伯父出对曰：“雪消成水”，幼小的王伯勋即对曰：“烟上成云”，其聪明好学，可见一般。八岁，由父母作主，与其父辈挚友沈国琮之女沈蕴淑订婚。辛亥革命后，安龙兴办了保国民学校，他即入保国民学校就读。一九一四年小学毕业，名列第一。一九一五年春，和其他同乡同学一道，步行到贵阳升学，在贵阳考取了模范中学。

王伯勋在模范中学读书期间，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及反对专制独裁的护国讨袁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此期间，他亲自看到了响应云南蔡锷讨袁之黔军王文华部凯旋归来，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场面，使之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教育。这些活动，在他思想上产生了“欲要报国，以军为上”的想法，决心投笔从戎。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觉得大丈夫应有所作为，处此乱世，只有从军才是报国之路”。他将自己的想法